

CHINA

中国
山水文化
大观



中国山水文化大观

段宝林 江 溶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书名:中国山水文化大观

著作责任者:段宝林 江溶

责任编辑:刘方

标准书号:ISBN7-301-01858-4/G·110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编: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毫米 16开本 71印张

2667千字

1995年1月第一版 1996年7月第二次印刷

定价:155.00元

中国山水文化大观

主编

段宝林 江溶

编委

毛卓亮 刘亚湖 刘思敏 朱芹勤
乔卫 谷声应 陈连山 陈学勇
邵永海 张黎明 奚学瑶 高志宏
曹广志 彭文新 潘泰泉

撰稿人

王丽 王泉 王清廉 王新京 毛卓亮
方昱 丛榭 刘亚湖 刘思敏 刘瑾
吕雅贤 吕滇雯 朱芹勤 乔卫 伍皓
向永丰 孙素英 辛平 谷声应 陈连山
陈学勇 陈贵顺 陈晓红 陆自振 邵永海
林德崇 张凤珠 张黎明 胡艺 段宝林
奚学瑶 高志宏 曹广志 彭文新 葛晓音
董学彦 谢淑颖 蓝霖 熊英 熊木舟
潘泰泉 薛梅

图片摄影

罗哲文 谢凝高 张铭心 刘玉芳 薛佳
闫继斌 段宝林 宋祥瑞 马逢皋 刘锋

总序

走向新的
世纪

江 溶

一九九〇春
于北京大学寒暑斋

半个世纪前，一位哲人曾忧郁地发问：中国文化之美丽精神往何处去？今日思之，犹怦然心动。国情日新，宇宙恒变，处于当代世界文化大视野中之吾国文化，如何在东西文化之碰撞与融汇中铸造崭新生命又永葆其美丽精神，实非等闲之事。

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雄浑浩茫之文学艺术，博大宽容之哲思气质，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兼收并蓄之文化表象，实乃中华民族灵性之结晶。中国文化品格，重各类学术文化精神之融和，而恒以完美人格之形成和民族文化之弘扬为旨归。故《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在于知人。盖人者，关乎文化精神之消长，民族气运之盛衰也。鉴于此，予以为，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故而，冷峻把玩与审视国宝家珍，重塑华夏审美文化人格，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之要旨。为此大计，遂策划有《中国文化大观系列》，奉献给炎黄子孙，朋友同道。

“大观”者，取其繁富多彩、洋洋大观之意也。或窥视字里乾坤，以追溯文明根系之久远；或叩访古迹名胜，以探测文化积淀之丰厚；或遍览岩穴陵寝，以寻觅初民五彩之梦境；或博采艺苑精华，以领悟先哲创造之伟力；或追摄古今，以把握社会历史之脉向；或俯瞰东西，以通晓宇宙人生之底蕴。每卷力臻纵涉古今，横贯史论，汲取学术探究之新论诒识，承接世界文化之八面来风，以穷“有边无边”之理，得“有尽无尽之见”（章太炎语）。《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每卷字百余万，图数百幅，力求视野开阔，见解新鲜，资料丰饶，文笔生动，装帧精美，居较高层次而涉猎中国文化之方方面面，并兼具学术理论、鉴赏收藏与工具书之价值。

大浪淘沙，真情不泯。此大观得以问世，幸赖新老同仁鼎力相助，精诚合作。玉壶冰心，表里澄澈，清贫自守，民族脊骨。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值此世纪将去之际，我等恳祈海内知音，承之以艾，继之以油，同裁吾古国五千载之悠悠霞彩，共织我中华新世纪之灿灿云锦。

是所望焉，谨序。

A GRAND EX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ERIES

GENERAL PREFACE

Jiang Rong

Half a century ago a sage full of misgivings asked: "Whither is the fin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When we recall his question today, we feel the same bewilderment.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is daily changing, and the world is in a constant flux.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e, tha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being transform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in the fu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is a matter of no small importance that our Chinese culture should acquire a new life and yet preserve and develop its fine spirit for good and all.

As to culture, it is the light to the soul of the nation. Sublime and uplifting art and literature, the magnanimous and tolerant philosophical temper, the everlasting national spirit, the all-embracing and eclectic attitude of culture—all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thos. The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stresses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iming at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he propag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hus say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heavens move steadily, and the good man never ceases to perfect himself." Confucius says: "The superior man is affable, but not adulatory; the mean is adulatory, but not affable." Mencius says: "I will build up my manly spiri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we must know the man who makes it. It is man who affects the growth or decline of the spirit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or decay of a nation. In view of this, I

consider the roots of culture to be found in man.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is going on every day and is ever renewing, showing an infinite variety and aiming at the highest perfection. Consequently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crutiny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treasures of our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remoul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ropagate the best heritage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Hence the *Grand Exposition Series*, to be presented to people of a Chinese origin as well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 Grand Exposition" implies the multifarious variety and the all-embracing range of our cultural treasures on exhibition. Some books in this series deal with philological evidence, tracing the origin of our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thers are travel books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s of cultural sites and scenic spots; still others are descriptions of cav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and subterranean royal tombs. There are also books of art history, soci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what not. Each volume in the series contains over a million words and more than a hundred illustrations. Each volume presents a broad vista, a fresh approach, and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each is written in a lively style, and is in an exquisite binding. The series survey all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an expert way so that they can serve as scholarly works, reference books, collectors' pieces, etc.

The series are made possible by the joint support and united collaboration of

our whole staff. We extend to all our heartfelt thanks.

As the present century is drawing near its end, we look expectantly into the futu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our reade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support our efforts to rejuvenate and glorify the everlasting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University
Spring, 1990

代序

山水情绪与
审美人生

宗白华

晋代是中国山水情绪开始与发达的时代。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郢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閤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规箴》，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而这一切无不和魏晋人的山水情绪有关。

《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雲林、钱舜举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言,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垢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阮籍登临山水,尽日忘归。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的《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郊东岵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铄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恻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王羲之的《兰亭》诗云:“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

“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晋人对于山水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以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

中国山水画的独立，起源于晋末。晋宋山水画的创作，自始即具有“澄怀观道”的意趣。画家宗炳好山水，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又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他这所谓“道”，就是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也说绘画的手段和目的是“迁想妙得”。这“妙得”的对象也即是那深远的生命，那“道”。

中国绘画艺术的重心——山水画，开端就富于这玄学意味（晋人的书法也是这玄学精神的艺术），它影响着一千五百年，使中国绘画在世界上成一独立的体系。

他们的艺术的理想和美的条件是一味绝俗。庾道季见戴安道所画行像，谓之曰：“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以戴安道之高，还说是世情未尽，无怪他气得回答说：“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然而，也足见当时美的标准树立得非常严格，这标准也就一直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标准：“雅”、“绝俗”。

这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晋人这种风度、美感和艺术观，也是对孔子超然、蔼然、爱美爱自然的生活态度的遥遥嗣响。孔子是中国二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原”，那就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原，德之贼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更时常警告人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伟大的真挚的同情心是他的道德的基础。……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他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还要“游于艺”。他对于音乐有最深的了解并有过最美妙、最简洁而真切的形容。他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他欣赏自然的美，他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他有一天问他几个弟子的志趣。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说过了，轮到曾点，他问道：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晋人王戎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我们的山川大地不仍是一片音乐的和谐吗？我们的胸襟不应当仍是古画家所说的“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吗？我们不能以大地为素纸，以学艺为鸿钧，以良知为主宰，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新世界吗？

前言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葛晓音

大自然似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聚集了全部的神奇和灵秀。这里有号称“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也有全世界最低的盆地吐鲁番；有苍莽的塞外雪岭、雄浑的黄土高原，也有秀丽的江南烟景、浩渺的海域风光。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复杂的地貌，使中国的山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观。黄河从巴颜喀喇山发源，流经九省，东入渤海。沿途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洪波荡漾，峭壁夹峙；华山、嵩山和泰山巍然屹立，气势磅礴，显示着中原山水雄伟庄严的气派。长江从唐古拉山发源，流经十省、市、区，奔入东海。沿途云雨霏微的三峡，烟波淼漫的洞庭、突兀森耸的南岳，瑰奇明秀的庐山，又展现出江南山水奇绝清丽的姿貌。

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雁荡天台的奇峰飞瀑、碧潭清溪，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大潮，富春江清澈见底的急流，富丽妩媚的杭州西湖以及清瘦秀雅的扬州瘦西湖，使吴越的山光水色充满了变幻无穷的趣味。相传由东海飘来的罗浮山、布列如北斗的七星岩、山青水碧的清远峡、“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远至琼岛的天涯海角，以及风光旖旎的日月潭和阿里山，又为情调独特的东南海疆增添了传奇色彩。而在西部边陲，天池、哈纳斯湖、天鹅湖、博斯腾湖等高山溶雪汇成的湖泊，宛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瀚海之中；青藏高原上的斑公湖和青海湖，向来是鸟类聚居的大千世界。东北关外，火山爆发造成的镜泊湖、兴凯湖和五大连池，犹如童话中的仙境；长白山以其特异的林海天池、完整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种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山地自然景观。至于峨眉的佛光、云南的石林、黄果树的瀑布、张家界的天然盆景、九寨沟的原始森林、苍山洱海的云雪峰溪，以及由岩溶地形所构成的桂林山水，更是驰名天下，蕴藏着探求不尽的神异魅力……

大自然如此偏爱中华神州，华夏民族也特别珍视造化的厚赐。早在二千多年前，先哲们已懂得通过自然景观探索宇宙的奥秘，获得对人生的启示。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

者静。”这虽是借山水以为形容，以水的周流无滞比喻智者的缘理而行，以山的安固厚重比喻仁者的沉静仁厚，但已能“从山水自然中讨消息”（钱穆《论语新解》），看到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对于人性和道德的助益。《易经》从自然中选取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物，作为世界的根源，从中寻找事物对立发展变化的规律，山水便成为人们观察宇宙变化的依据。庄子又进一步提出：自然界存在着“地籁”和“天籁”，“地籁”是清风击荡山林、石竅怒动而发出的声音，“天籁”则是空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各得其性的意趣。人只有达到忘却自我的境界，才能认识天籁。这一说法，为后世的山水审美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哲学家从山川风云等自然现象中抽绎出宇宙万物构成的原理，诗人们则向自然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共鸣。《诗经·卫风·竹竿》中的男主人公，因思念远嫁在卫的女子，而借泛舟水上排遣自己的忧闷：“淇水滢滢，桹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而《郑风·溱洧》中的青年男女则在三月上巳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之时，互赠芍药以定情，春意方盛的溱水和洧水便为这场人生的戏剧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环境。《楚辞·九歌》所祭祀的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神灵，其实就是太阳、星辰、云气、黄河、湘水、山岳等自然景观的拟人化。楚人赞美赋予他们光明和生命的日月山川，为悬想中的神灵设立祀典，而这些祭神的乐歌，又是多么真实而美妙地描绘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这些自然神并无神的威力，只有人的感情，与其说他们是主宰自然的神灵，毋宁说是人格化的自然。我们的先人从来不对自然神顶礼膜拜，而是与神灵一起融洽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同喜同悲，相恋相思。所以他们从开始认识自然时起，就与山水结缘。大自然作为人生的同类，处处给人以启迪。山石草木的永存，使人感受到人生的短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陵上柏树常青，涧中众石常在，正与远行客般的人生形成对照。而日月星辰的运行，又激起人对于广漠宇宙的怀想：“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秋风卷起的波涛吹送来四时更递的消息，无边的大海似乎具有包容日月星汉的度量。或许是因为汉魏以前对于山水自然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偏重于人生和宇宙的思索，景物自身的美反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然而这种初萌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在老庄思想的催化下，很容易发展为一种审美的哲学。两晋以后，“山水体现自然之道”的观念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老子曾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的是一切非人为的、天然的存在。庄子认为自然是万物的天性，西晋郭象在注《庄子》时又加以发挥，指出“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所以“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这就一步步地将天地万物与自然之性联系起来，最终必然得出“山水体道”的结论：“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其二）既然造化之功至大至广，均匀地分布于万物，那么碧天、绿水之间所有寓目的景物当然都体现着自然之理。所以，“茫茫大造，万化齐归”，“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孙统《兰亭诗》其一），在终日流连山水、体会自然之道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对自然界本身的美有会于心。王子敬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顾恺之称道会稽山水之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晋人观赏山水往往由实境而超入玄境，又从玄境返归理趣。由于哲学的彻悟，这初发现的山水美对晋宋人来说，便格外新鲜活泼。

当山水从“道”的体现转化为审美对象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更加和谐亲切。山水不仅可以澄怀观道，而且逐渐从玄虚的理境变为人的感情的组成部分，正所谓“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物色相召”，“情以物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山水可以是游子客思的排遣：“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可以是思妇离愁的见证：“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江淹《别赋》）它使隐者找到精神的归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归

园田居》其一)使志士激发起进取的意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它可以洗涤世俗的尘垢:“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其五)可以消解政治的垒块:“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人们在与自然的感情交流中认识了山水多样的美,而亘古不变的江山又常触发人事沧桑的浩叹,以及关于时空永恒的思索。因此中国人对山水美的观赏是与深邃的宇宙意识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交织在一起的,既有玄远的哲理意味,又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这就是中国山水审美观的基本特征。

二

山水不但给人审美的快感,而且影响着人的素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他认为污浊的水使人愚笨,清凉的水使人正直,人的体质、容貌、性情、道德由水的不同性质而定。《淮南子·坠形训》则说:“土地各以其类生。……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一种坚硬干燥的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这样分类虽不一定科学,却也道出了山水以气类感召人类的客观现象。因此,当晋人发现山水美的时候,同时也注意到了它与人物美的关系。《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汜渌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他们甚至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之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天性一般简淡贞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也往往有一股磊落不平的英气。初唐才子王勃在他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将前人的这些认识归结为八个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热情地赞美了赋予我们民族以灵杰之气的大自然。

中华山水以其光华灵秀养育了一代代入杰,而人民也以辛劳和智慧美化着大自然。许多山水胜景之所以著名,乃是因为流传着祖先改造河山的动人故事。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至

今仍可在长江大河的险要之处觅见他的足迹:他曾在黄河峡谷中开凿龙门,曾在涂山会集诸侯商量治水,曾在巫峡神女峰下得神女授书……遍布各地的禹王庙,使他的功绩世代在人民口中流传。如果说大禹形象集中地体现了上古劳动人民改造山河的决心和魄力,那么四川的都江堰和桂林的灵渠便是纪元前伟大水利工程的实证。分水大坝的科学设计,不但可以拦河排洪,灌溉通航,使当地二千年来得受其利,也为天下闻名的天府之国和桂林山水增添了宏伟的景观。

许多山水胜景之所以著名,还因为被民间生动的传说丰富了它们的内涵。大自然本来有许多天生的杰作,再加上人们的想象,便平添了无穷的魅力。南方名山多以峰岭奇特、姿态百出著称,人们便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体验,按照其外形和意态命名。如黄山的“梦笔生花”、“猴子观海”,“仙人晒靴”、“仙女绣花”、“老僧打钟”、“武松打虎”;雁荡山的“犀牛望月”、“雄鹰敛翅”、“夫妻峰”、“婆婆峰”;桂林阳朔的“美女照镜”、“书童山”、“骆驼山”、“月亮山”、“象鼻山”等,本是天造地设,但一经定名,便愈觉生动奇巧。至于桂林芦笛岩、七星岩,富春江畔的瑶琳仙境等著名溶洞中大量玲珑剔透的石乳、石筍、石柱、石幔、石花,组成“狮林朝霞”、“红罗宝帐”、“帘外云山”、“云台揽胜”、“盘龙宝塔”、“幽境听笛”、“远望山城”等多种景色,更是使大自然的艺术之宫宛然成为人类想象中的神仙世界。

也有不少景色优美的地方,因流传着动人的神话传说而越发令人神往。如天台山的“桃源春晓”,因传说东汉阮肇在此遇见仙女,后人遍植桃花以附会故事,遂成为天台最有名的一景。《山海经》说周穆王西游,与西王母在瑶池宴乐,原来这瑶池就是新疆天山博格达峰的天池。又如华山莲花峰上的斧劈石,传说就是神话里沉香劈山救母的地方;玉女峰是春秋隐士萧史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成仙后的住处;而仙掌崖上的巨掌,则是巨灵神为给黄河劈开通道,手推华山时留下的印迹。这些传说赋予华山不朽的精魂,活生生地展现了西岳的威灵和神奇。

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少特异的景色往往伴随着民间的爱情故事。如九寨沟的一百多个高山湖泊,相传是男神山达戈向女神山沃诺色莫求爱

时,赠送给她的一百多面镜子。苍山上的望夫云,是南诏国的公主因苦思她那葬身在洱海水底的爱人而在死后所化。云南石林中的阿诗玛峰,是撒尼族姑娘阿诗玛被邪恶势力害死以后变成的。这些故事,有的是因山水的异状引发人们的想象而形成传说,有的则是民间传说在山水的特殊形态中找到的印证。倘若没有这些迷人的传说,山水就失去了灵动的生命。人们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同类,使之分享自己的痛苦和欢乐。受迫害的好人虽然在现实中不能避免悲惨的结局,但在民间传说中,死后总能化为山石云树,与大自然同在,获得精神的永恒。因此,人们热爱山水,不仅因为人类赖以生存其间,并从中得到审美享受,还因为自然能给予人们在社会中难以找到的公道,使人们的理想藉山水的传说永久流芳。

三

中国的山水名胜有不少是因帝王而得以扬名的。封建帝王遵照敬事上天的传统,崇拜山河日月之神,并列入正式祀典,五岳的祭秩与王公的等级相同。在帝王的观念中,名山大川也臣服于天子的统治。传说楚襄王在高唐游览,喜爱巫峡的景色,以致梦见巫山的神女都来侍候枕席。汉武帝在泰山、嵩山封禅时,听到山里有山呼万岁的声音,便在此建起祠庙,以后封禅五岳就被视为太平之世的盛举。山水如果懂得奉迎帝王,便失去了它那超尘脱俗的自然意趣。但历代帝王的祭祀在山上留下了重重叠叠的古代建筑,却又使五岳的名胜在全国名山中占了前列。

出于君权至上的观念,古人往往认为帝辇所至,可为山水增辉。不过今天看来,这些因历代帝王的临幸、驻蹕而得以传世的名胜,历史内涵却远非如此肤浅。与帝王生活有关的名胜大多叠合着兴亡盛衰的印记,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例如以温泉出名的骊山,曾有周、秦、汉、隋、唐等王朝修建过离宫,唐玄宗时达到极盛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前夕,他仍与杨贵妃在此寻欢作乐。大乱之中,华清宫被烧毁,从此一片荒凉冷落。而唐朝的国运也在安史之乱中一蹶不振。于是华清官便作为帝王因荒淫骄奢而招致国家祸

乱的一个例证,常被后人引用。又如号称“西湖门户”的保俶塔,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遗迹。北宋建立以后,宋太祖召吴越王钱俶进京,钱俶的舅舅吴延爽发愿建造此塔,祈求佛祖保佑钱俶平安归来。因此这座塔又成为宋初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这段历史的见证。又如清王室在北京西郊大规模兴建起来的皇家园林,曾经遭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两次浩劫。被西方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为一片废墟,至今仍作为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给人们以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

封建帝王选择山水佳胜处兴建离宫别墅,固然是为了满足享乐的欲望,但作为名胜古迹传留至今,却也令人窥见我国古代盛世文明的灿烂辉煌,足以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帝王爱好山水已成传统,从春秋战国时起,便已有帝王苑囿的记载。汉魏以前的苑囿与后世的园林不同,实际上是将大片山林和平原广泽划为帝王田猎的区域。正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所形容的那样,“终始灞沪,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这些苑囿均以规模宏大为主要特色,典型地反映出秦汉帝国处于全盛时期的伟大气魄。隋炀帝爱好江南山水,发民夫百余万,开凿大运河。用人力牵挽龙舟数百艘南下,在扬州建立游乐的行宫迷楼。固然奢侈至极,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只有在隋代经济极其繁荣的时代才能实施。更何况南北通航,还大大促进了商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唐末诗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五代吴越国定都杭州,钱氏政权大兴水利,河湖港汊都修造堤堰闸门,在钱塘江入海处筑起捍海塘,疏浚西湖和河道,大造花园和佛寺,使江南水乡变得更加美丽富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就是从这时传开的。吴越国遗留的灵隐寺石塔、六和塔、保俶塔、临安功臣塔等至今仍是西湖著名的胜景。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在西湖四周和城内造起无数行宫御园,水阁别馆,御道渠岸遍植桃李垂柳,君臣终日在湖山之间寻欢作乐,虽然历来遭后人讥评,然而杭州山水也得以充分开发,西湖七景中的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等都是南宋的遗迹。清代帝王对山水的爱赏更甚于前人。明代皇宫庄严宏伟却又缺乏草木的环境

使他们感到单调枯燥,所以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不但在北京西郊造起迤迤二十里的皇家园林区,而且在承德兴建了多处行宫。著名的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基调,取自然山水的本色,兼有江南塞北的园林之美。那里不仅是避暑的胜地,也是清王室协调民族关系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除此以外,清代帝王还大规模地开发南方的山水,扬州瘦西湖就是在清中叶形成的一处由山林自然美和园林艺术美相结合的湖山胜景。它与杭州西湖相比,另有一种清瘦秀丽的特色。康熙、乾隆四次下江南都到扬州,园林里的花木繁石,经皇帝题词咏诗,声价倍增。与此同时,全国重要的名胜也都得到大规模的整修和保护。乾隆帝游遍天下,留下了许多题诗和墨迹。诗未必尽佳,却能令人想见康乾盛世的繁荣气象。

因此,古代帝王以游赏山水为乐,甚至死后也要葬在青山环抱的风水宝地,这在客观上对于开发自然、保护名胜作出了重大贡献。又由于帝王的更替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于是当人们在指点着帝王昔日起居、行乐的遗迹,为其宫殿陵寝的豪华奢丽而惊讶嗟叹之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络。

四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山水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文思的源泉。屈原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主要得自楚国川泽山林“光怪之气”的助益。李白之所以成为诗坛巨星,乃是因为“幕天席地、友月交风”是他“平常过活”。中国长期稳定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使人与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联系。中国文人又向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不得意的文人,往往以隐逸作为退身之路。隐逸的性质固然不同,有厌恶世俗、不肯和光同尘的真隐;也有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的假隐;更有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朝隐”;还有将外郡当沧洲、以别业为田园的亦官亦隐。但不管哪种隐居,都是在山林丘园里寻找精神平衡的支点,山水自然便成为诗文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

中国文人很早就懂得“文者气之所形”的道

理,为了养其浩然之气,司马迁曾走遍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盛唐文人从少年时便开始壮游,几乎没有一个著名诗人不曾眺览过齐鲁、吴越和蜀中的山水。宋代文人更是自觉地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登览自广”、“激发志气”。因此中国的名山大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许多本不知名的山水也因伟人的登览而扬名天下。

自然形态的山水,经过艺术的描绘,才能充分展示出深蕴其中的美。泰山的雄伟壮丽,若无杜甫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两句诗来概括,则难以显示出它那一览众山小的气派。华山的险峻为众所共知,但只有读过李白的《西岳云台歌》,才能体会出它的峥嵘峻伟,以及黄河触山动地、奔腾倾泻的气势。庐山的奇秀壮美一言难尽,只有李白能够挥动如椽巨笔,写出“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景观,将人引到纵观天地,俯视一切的高度来领略这无尽的壮美。衡山平时云雾弥漫,很难看见峰顶,而幸运的韩愈却在默祷之后见到了它的真容。《衡岳》诗苍硬雄壮的气势和森耸奇峭的风格,使人从声情上便充分感知了南岳的雄怪和威严。

许多不为人知的青山秀水,往往因著名文人在此游览、居住、题咏而名垂千古。马鞍山市西南长江边上的采石矶,峭壁兀立,江涛似雪。李白最爱此处景色,写下过《横江词》、《天门山》等七绝名篇。他的墓又在离此不远的当涂青山。于是关于李白醉酒捉月溺死江中的传说便在这里找到了印证。采石矶陡峭崖壁上一块突出的石台,被附会成李白跳江的捉月台,加上矶上的太白楼,翠螺山腰的衣冠冢等遗迹,使采石矶成为纪念李白的一处重要名胜。成都郊外的浣花溪,原来是一处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幽静的江村,大诗人杜甫来此营建草堂,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作诗二百四十七首。后人在原址修起纪念祠堂,历经宋元明清增建,遂使杜甫草堂成为一大胜景。滁州之山,虽有“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等四时景致,但并无奇特之处,然而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却写得那般快活热闹,不拘形迹的可爱的醉翁形象,使琅琊山和醉翁亭都有了独特的佳趣。三国赤壁大战的古战场,真正的遗址在湖北蒲圻县已经确认,然

而苏东坡贬到黄州时,根据当地人指赤鼻矶为赤壁的传闻,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由于这些词赋以雄浑的气势赞美了壮丽如画的江山,诗情与哲理融为一体,历来被誉为赤壁怀古的绝唱,所以这里虽是假赤壁,也同样吸引了后代无数文人来此题咏,以致使东坡赤壁的名声甚至掩过了真赤壁。

当然,有些因文人得名的胜景,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留下了大量传世的诗作,更重要的是其中凝聚着他们带领人民改造山河的劳动。西湖的白堤,因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最爱来此散步吟诗而得名。但人民怀念白居易,则是由于他确曾在钱塘湖筑堤,解除杭州旱情,并将管理湖水的经验刻在石上留给后任。西湖的苏堤和“三潭印月”的环形堤埂,则是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组织二十多万民工,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泥堆成。人们在苏堤漫步欣赏西湖从晨雾中苏醒的美景时,自然也会想到苏轼对杭州人民的一片深情。

和苏轼一样,中国的许多文人对山水的热爱与他们关怀人民的感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头虚构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空想社会,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普遍愿望。人们为了寻找这个世外桃源的原型,提出了种种附会的说法,以致湖南桃源境内景色类似的桃花源从唐宋以来成为无数文人慕名寻访的胜地。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应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之请,为重新修葺的岳阳楼写了一篇记文,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以宏伟的气势概括了洞庭湖衔山吞江的浩瀚景象,然后由岳阳向来是谪居之地这一点生发感想,描绘古往今来的被贬文人在登楼观望洞庭湖阴晴不同的景色时所产生的悲喜之情。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因为离开故乡、忧惧谗害而悲,或是因心旷神怡、荣辱皆忘而喜,都是因外物而感,为自己而发,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合乎古仁人之心。这一光辉思想的提出,是这篇文章能传诵千古的主要原因。岳阳楼也因此而更加出名。

像这样因一篇名作而使一处胜景扬名天下的例子不胜枚举。昆明的大观楼远近闻名,固然与滇池的美丽风光有关,但更吸引人的还是楼前门柱上一副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这副长联全

面概括了滇池的山川地形、四时风光、朝暮景色,以及古今历史,辞采清雅优美,意境萧疏悠远,富有情思。因而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优秀的诗词对联能使自然美的意蕴透发无余,提高山水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唐诗,因深受人民喜爱,造就的名胜更多。最典型的莫过于武昌的黄鹤楼和苏州的寒山寺。关于黄鹤楼的来历,本有不少神话,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辛氏卖酒,因道士为之画鹤能舞而致富,十年后道士乘鹤飞去。盛唐诗人崔颢就用这个故事写了一首七律《黄鹤楼》。诗中优美的意境、流畅的音调以及悠远的情思,打动了无数读者,使大诗人李白来此读了,都觉得难以超过。从此黄鹤楼更加声名大震。姑苏寒山寺之出名,则主要是因为唐天宝年间诗人张继写了一首著名的《枫桥夜泊》,诗写夜泊姑苏城外枫桥,面对江中月色,点点渔火,声声乌啼,令人难以入寐的情景。这时半夜里从寒山寺传来的钟声,更触动了客子的愁思。诗境优美含蓄,尤其是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为这寂静而萧疏的秋夜平添了无限深永的韵味。从此以后,诗韵钟声千古流传。

在中国的文人中,最受尊崇的莫过于儒学大师。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屡经朝代更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却基本不变。因此,孔子、朱熹等先圣先师享受天子王侯的祭祀礼仪,他们的遗迹受到历代统治者的保护,又为中国的山水名胜增添了浓厚的书卷气。遍布全国的孔庙,规格比拟皇宫。而昔日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庄子·渔父》),原本是相当浪漫的。如今帷幕般深密的林荫和江滨长满杏树的高坛早已不存,而曲阜孔庙中却象征性地筑起一座杏坛,令人想起《论语》中孔子说过的愿与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朱熹执教的书院几乎都在山水清丽的地方。如庐山五老峰下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周围层峦耸翠,山涧幽深。武夷山的紫阳书院,坐落在九曲溪五曲隐屏峰下。朱熹从小在这“奇秀甲于东南”的著名风景区长大,后又在紫阳书院执教十年之久。武夷风光在他的《九曲棹歌》中概括无遗。九曲溪两岸悬崖壁洞中的架壑船经过朱熹的研究,确认为古代少数民族部落的遗存。朱熹在崖壁上亲题的孔子名言“逝者如斯”和九曲歌,又吸引了后世许多学子慕名前来观

赏。自然风光与学术气氛的融合,使这些名胜别具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

五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寺道观几乎占尽了天下的好山好水,这是中国山水名胜的又一显著特色。道教中人以遁迹避世为宗旨,自然要潜入深山与鸟兽为群。而沙门也选择山林修行,却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要在士大夫中流播,必须与魏晋盛行的玄学,即老庄哲学相结合。讲究养生的士大夫多半信奉道教,好谈玄理。一些具有谈客风采的名僧如支遁、慧远等便用佛理阐发庄子思想,首先从义理上征服东晋的名士。同时又借鉴道教练丹采药的做法,“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因咏山水”,在清谈和玄言诗里发挥自然之道。既然佛教首先以深谙山水自然之理的姿态博得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仰,又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在遁迹方外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么有山必有佛寺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佛教在士大夫中生根后,势力很快超过了道教。尤其是大乘教中的净土宗提倡因果报应,大修功德,营造塔庙,多多念佛,经慧远推广,发展极其迅速。由于这一宗派的发达,佛教才真正深入民间,并被帝王普遍接受。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营造了无数寺塔庙宇。尽管历经战火,屡遭毁弃,但又历经修缮,屡有增建,因此在许多古迹被历史湮没之后,佛教文化却藉寺庙造像等形迹得到了长久的保存。

僧道历来受到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学的排斥,但它们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容低估的。佛教由印度传入,而中国佛教哲学却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印度。不少宗派的祖庭都在中国。如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创设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始祖。唐时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曾来东林寺,与此寺和尚智恩同去日本。慧远和东林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慧远为始祖。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玄奘法师去天竺学瑜伽,吸取了天竺佛学的全部要义,并在曲女城的无遮大

会上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教所有论敌,取得无上的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超过天竺。唐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宗虽然已经失传,但他为贮藏佛经而修建的大雁塔却仍在西安巍然屹立,昭示着中国佛学这段辉煌的历史。隋唐佛教的天台宗,是中国的智顗和尚所创立的宗派,天台山上的隋代古刹国清寺,便是其发源地。日本僧人最澄于唐贞元年间来此学习天台宗、禅宗、密教等教义,回国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国清寺便成为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在世界上第一次测出子午线长度的一行和尚,曾向寺僧请教过数学,为纪念一行的成就,寺内至今还保留着他的遗迹。衡山的南台寺则是曹洞祖师希迁的道场,南宋时曹洞宗传入日本,日本佛教曹洞宗一直视其为祖庭。这些寺院长期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号称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的五台、九华、峨眉、普陀,以及道教名山武当山,自然风光的奇特和宗教建筑的配置相辅相成,既是信徒朝拜的圣地,又是游人向往的胜景。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宋时名声已远播日本、印尼、尼泊尔等国家。台内台外现有的四十多座寺庙,保存着北魏、唐宋金元明清的各朝建筑,在世界佛教史和建筑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被唐代诗人李白和刘禹锡赞美过的九华山,自从在唐代成为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历代修建的寺院便不断扩大,“佛国仙城”的美称已压倒了山水云壑的异采。专供观音菩萨的普陀山,又自有另一番“海天佛国”的风光。紫竹林中石纹奇妙的紫竹石和吞吐海潮、声如雷音的潮音洞,仿佛是为观音现身而生成的天然奇观。峨眉山一百二十余里的游程中,寺庙古迹,重峦叠嶂、流云瀑布、奇花异木,令人目不暇给。金顶云海上经常出现的佛光,本是日光反照云气所形成的奇观,因这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顶的圆光。方圆四百公里的武当山,七十二峰,二十四涧,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九台的风光名胜与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相对应,形成五里一庵,十里一宫的宏伟规模。道教经籍上传说的真武帝君修炼乃至最后飞升的遗迹,在山上处处得以坐实,使游人在追踪其一生的过程中饱览了所有的险绝奇景。

宗教信仰保护了许多著名的佛寺道观免受